

「生態、生計、文化與可持續和平——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平婦女』行動研究」報告
網上版

作者：陳順馨、陳惠芳、趙群、羅燕

編輯：張彩雲、陳順馨

出版：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和平婦女」項目

香港屯門，2014年2月

目 錄

1. 前言

1.1 「和平婦女」是誰？

1.2 為何要將和平的討論扎根於生態、生計、文化的關注或議題上？

1.3 「行動研究」是甚麼？

2. 生態與發展之間的張力

2.1 (雲南) 優內與猛宋光明村婦女小組：在主流市場經濟衝擊下尋找出路

2.1.1 行動計劃背景

2.1.2 綠肥種植和有機堆肥實驗

2.1.3 有機茶葉銷售

2.1.4 生態與發展的張力

2.2 (內蒙) 殷玉珍：種樹治沙與發展的張力

2.2.1 行動計劃背景

2.2.2 建立生態教育基地

2.2.3 發展的張力

3. 和平方動的性別主體

- 3.1 (山西) 王樹霞和段鎖蘭：女性作為生態耕作轉型的知識主體
 - 3.1.1 行動計劃背景
 - 3.1.2 生態種植與健康生活培訓工作坊
 - 3.1.3 以沼液代替化肥農藥的實驗
 - 3.1.4 水果品嚐和果園觀摩交流活動
 - 3.1.5 女性作為知識主體
- 3.2 (江西) 王華蓮與婦女鼓隊：社區音樂的行動主體
 - 3.2.1 行動計劃背景
 - 3.2.2 建立婦女鼓隊
 - 3.2.3 社區音樂工作坊
 - 3.2.4 社區音樂會
 - 3.2.5 面對水污染問題
 - 3.2.6 婦女作為行動主體

4. 另類生活的可能性

- 4.1 (香港) 王愛華、楊寶熙、陸少瓊：從食物展開的城市生活思考
 - 4.1.1 行動計劃背景
 - 4.1.2 「快樂廚房@社區」行動計劃的展開
 - 4.1.3 社區有廚房，廚房有社區
- 4.2 (台灣) 徐蘭香：從護士到養生到集村的嘗試
 - 4.2.1 行動計劃的背景
 - 4.2.2 「養生護士俱樂部」背後的理念
 - 4.2.3 「養生護士俱樂部」行動過程：從外出探訪到「集村」的嘗試
 - 4.2.4 結語：一位地球守護者與母親的和平願景
- 4.3 (四川) 高清蓉：以建立城鄉共同體保護地球
 - 4.3.1 行動計劃背景
 - 4.3.2 配送蔬菜和消費者教育
 - 4.3.3 生產者的聯系和教育
 - 4.3.4 掌握生態種植技術
 - 4.3.5 建立生態農耕示範園
 - 4.3.6 總結：逆流而上的選擇

5. 總結：可持續和平的條件和願景

- 5.1 從日常生活做起
- 5.2 重視婦女的智慧與行動力量
- 5.3 打破身份、地域界限
 - 5.3.1 研究者與行動者的界限

5.3.2 地域上的界綫

5.4 和平的邏輯及價值的傳播

報告內容

1. 前言

1.1 「和平婦女」是誰？

2003年3月，一個名為「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活動在全球展開，目的是在全球提名一千名女性爭評諾貝爾和平獎，從而引起世人討論何謂「和平」，並確認女性對和平的貢獻。發起這項活動的歐洲議會和瑞士國會議員維爾莫一文高博士說：「和平不可能是個人可以達到的，因此婦女走在一起，結成網路、團體和聯盟。從每天的工作，她們看到，和平並非僅僅是戰爭和軍事衝突的消滅……而是獲得安然的日常生活。」

和平不僅僅是沒有戰爭，而是獲得自在和安全的日常生活。而且，只有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地創造各種條件，和平才能持續。在大多數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中，男性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女性的角色被視為無關宏旨。諾貝爾和平獎從1901年設立一百多年至今，只有13名女性獲頒和平獎，就是一個例子。維爾莫一文高博士認為，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暴力——包括個人和制度層面的暴力——跟戰爭中出現的暴力息息相關，而女性往往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女性也是日常生活的守護者和和平的締造者。從守護家人和維護自身權益，到扶助弱小、結連社區和保育生態，女性都是在建立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也是在消除暴力的根源。

「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活動突顯了「和平」更廣闊的含意，以及女性在創造和平上的重要角色。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也有108名女性獲得提名。她們被統稱為「和平婦女」。但無論是1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還是108名來自中、港、台的女性，她們不但代表自己和她們的夥伴的貢獻，也代表更多更廣的女性群體。這些女性很多處身社會的底層或邊緣，但却有堅韌不屈的精神，並且一直為家人、鄰舍以至社會追求更美好和更公義的生存環境。因此，「和平婦女」這稱謂不限於獲提名的一千名女性，而是指所有通過日常生活實踐，締造和平的女性。

「和平婦女」的實踐十分多樣化，以中、港、台三地的「和平婦女」為例，有長期致力於維護勞工和弱勢社群權益的，有從事生態和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扎根鄉土為村民謀幸福的，有孜孜不倦以教育下一代為己任的，也有通過文字、影像和

音樂關愛眾生的。

自 2008 年起，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十多名婦女和她們的社群參與了一項名為「生態、生計、文化與可持續和平」的行動研究計劃，這項行動研究以香港的嶺南大學為基地，由一個來自香港、大陸和台灣的專業研究人員所組成的研究團隊負責推動。這群「和平婦女」中，一些來自遍遠的農村，一些來自繁華的城市。她們生產環保清潔劑，從事生態 / 有機耕作，製造具傳統特色的食物，推動「社區支持農業」，在沙漠植樹造林。總之，她們以各自的方式，守護家人和社區的生計和健康、保育生態和建設本土文化。

參加行動研究計劃「和平婦女」名單一覽

和平婦女/團體	所在城市/鄉鎮
殷玉珍	內蒙烏審旗河南鄉毛烏素沙漠
楊海瀾	寧夏銀川騰格里沙漠
王樹霞、段鎖蘭 栗家莊婦女協會/康達養豬專業合作社	山西汾陽市栗家莊村
王華連 路下灣里婦女互助儲金會	江西萬載縣白水鄉永新村
優內 勐宋光明婦女小組	雲南西雙版納景洪市勐龍鎮勐宋村
高清蓉	四川成都市郫縣安龍村
陸少瓊、王愛華 綠色女流/綠慧公社	香港
楊寶熙 自在生活	香港
徐蘭香	台灣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
邱靜慧 美濃愛鄉協會	台灣高雄市美濃鄉
陳來紅、陳秀枝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台灣

1.2 為何要將和平的討論扎根於生態、生計、文化的關注或議題上？

這項行動研究計劃的目的，是探究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地的「和平婦女」，她們在生態、生計與文化等方面所面對的暴力，以及她們處理 / 回應這些暴力的行動的經驗、策略和困難。

日常生活的各式暴力跟戰爭中出現的暴力息息相關。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對自然資源的需索，固然直接導致一些國家的內戰和對平民的侵害，但即使沒有戰爭或軍事衝突的地方，百姓也並未獲得「安然的日常生活」。事實上，隨著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裕，人們却越來越感到危機處處，如環境和食物污染、職業病、工業意外、糧食危機、社會不公、文化單一、傳統失落、等等。

過去幾十年，因為追隨西方的工業發展道路，崇尚資本主義和發展主義的經濟邏輯，中、港、台三地農村的人力、產品和自然資源，都用於滿足工業生產和城市發展的需要，但帶來的却是環境和食物的污染，危機四伏的工作環境和糧食價格不斷上升。與此同時，土地成為投機工具，農田日益荒廢，農村逐漸失去自給自足的能力。「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生活的改善並未減少社會不公，相反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峻，而只講究物質利益的社會文化則令人際關係更為疏遠，文化和精神生活更為貧乏。

如果「和平」是指和諧及安全的生活環境，那麼當今社會出現的種種生態危機、農民和基層市民生計困厄、社區解體、人心浮躁不安等，正顯示沒有戰爭不等於「和平」，暴力不限於軍事或武力衝突。而且，日常生活中的這些暴力，往往就是戰爭的直接和間接原因。因此，要獲得持續和真正的和平，就必須關注人們如何受到這些問題影響，他們怎樣面對這些問題，以及他們的行動帶來甚麼改變。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可持續和平」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的生態、生計和文化（包括關係、價值和知識）上。這三者息息相關，互為作用。簡單來說，可持續的生態是有機的、平衡的和循環的，即順其自然的；可持續的生計以尊重自然規律的態度、平衡的生產與消費關係和公平的流通，獲得足夠的物質資源維持生命和生活；可持續的文化則包含對人、土地和傳統的愛護和尊重，重新建立被切割的各種社會關係和崩潰的價值，促進性別平等，生產（包含積累和流通）橫向的、富創意的和解放性的知識等。

一直以來，大多數女性承擔著照顧家人飲食起居的責任，在維持家庭生計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此，不論是生態、生計還是文化上的危機，都對女性構成直接衝擊，而女性也以各種方式作出回應和尋找出路。這項研究深入探討了「和平婦女」在改善生態環境時，她們在生計上的考慮以及面對的矛盾。研究也探討了「和平婦女」處身的社會關係和價值體系如何影響她們的行動，這些社會關係和價值體系反過來又如何因為她們的行動而發生變化。

1.3 「行動研究」是甚麼？

行動研究是一個從經驗中學習的過程，是實踐、反思及學習三者的辯證互動。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或策略，參與式行動研究不會把研究對象視為被動的，而是積極參與整個研究計劃，包括行動的設計、執行、討論、評估以至發表報告，均與專業研究員一起推進。換句話說，研究與行動分不開，研究者就是行動者，行動者也是研究者，大家相互學習及分工合作本身，也是和平的過程。¹

……和平需要我們行動起來，改變人類的生存環境、社會制度及日常生活的態度和習慣，才能持續。

行動需要我們不斷對自己的工作及經驗進行總結和反思，並通過學習交流，更新我們的思維、價值觀、對事物的認識和工作方式，擴大視野，調整目標，創造新的可能性，才能持續。

研究，就是總結和反思經驗，並進行學習交流、更新、調整和創造的行動過程，讓我們原來有價值的和平工作能夠持續下去。

換句話說，研究就是行動的一部分，行動也是研究的一部分；我們都是行動者和研究者。在這個研究中，農村的生產者和城市社區的實踐者，跟在學術、研究和發展機構工作的，都是研究的主體：前者自己研究自己，後者也不同程度參與其中，扮演協作、輔助、觀察和紀錄的角色，最後，將大家的行動研究經驗進行總結及分析，變成有用的材料，供其他人分享及參考。這便是行動研究的含義。

總的來說，行動是和平和研究的中介。²

參與這項行動研究的「和平婦女」，2008年8月在銀川舉行的第一個工作坊中，各自針對自身面對的問題及需要，制定未來兩年的行動計劃。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是行動計劃的實踐/推動期，在此期間，研究團隊成員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和平婦女」協作各類活動和進行紀錄與訪談，她們之間也進行了互訪交流。2010年12月在香港舉行的第二個工作坊中，各人報告了兩年行動計劃的進展和結果，進而互相提問、討論、反思和總結。與此同時，研究團隊對部分行動過程進行影像紀錄，剪輯成一套名為《婦女、和平與可持續生活》的紀錄片系列³，在不同社區放映。可以說，除了各個點採取的不同行動方案，大家共同參與的工作坊討論、「和平婦女」的互訪與交流、錄影的製作與放映等，均是這個行動研究採用的方法，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景象、知識和情感，並顯示和平方行動的力量和行動的性別特點，這都是這次行動研究的成果。

¹ 「生態、生計、文化與可持續和平」行動研究計劃邀請信，2008年4月21日。

² 《銀川工作坊行動日誌》行動研究工作坊（一），銀川，2008年8月17~23日。

³ 這個系列包含六個紀錄片：《和平之旅——中港台和平婦女知識交流的行動》（2010）；《我鼓我歌——永新和平鼓樂隊的社區音樂》（2011）；《廚房有社區，社區有廚房》（2011）；《果樹下的草場——山西汾陽栗家莊生態故事》（2011）；《地上的天堂》（2011）和《源於生活的力量——婦女的和平方行動》（2011）。

以下將會通過三個重點：生態與發展之間的張力、和平方動的性別主體和另類生活的可能性，對七個行動計劃進行案例分析，展示各自的行動過程和含義，最後總結可持續和平方動的條件與願景。

2. 生態與發展之間的張力

2.1 (雲南) 優內與勐宋光明村婦女小組：在主流市場經濟衝擊下尋找出路

2.1.1 行動計劃背景

勐宋地處雲南西雙版納景洪市西南角的大勐龍鄉，與緬甸相連，是一個哈尼族愛侬人居住的山村。光明村是勐宋的一個自然村，大約 80 戶農戶，全村的主要生計是種植水稻、蔬菜和茶葉。光明村的婦女小組於 2003 年在雲南省生物多樣性和傳統知識研究會 (CBIK) 協助下成立，CBIK 說服婦女種植蔬菜，組織蔬菜種植小組、茶葉種植小組，並進行小額貸款。優內是光明村的婦女小組組長。2008 年在「和平婦女」行動研究的「銀川工作坊」上，她提出的行動計劃之一，是為勐宋的有機茶尋找銷售網路，促進有機茶葉的銷售。

愛侬人傳統上是以刀耕火種的輪歇農業為主，但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受「以糧為綱」的國家政策影響，當地的森林被開墾為水田和菜地。70 年代後，勐宋作為茶葉種植重要區域，開墾大批新型茶園。2000 年後，茶葉市場的價格逐年攀升，每年在輪歇地和森林中開闢的新茶園快速增長，至 2008 年勐宋的山地九成給開墾種植了茶葉，茶葉成為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

然而，2007 年茶葉經濟泡沫爆破，普洱茶的價格從高位陡降，跌至上年價格的十分之一，不少村民因此負上沉重的債務。2008 年行動研究展開時，優內最希望解決的，自然是村民的生計問題，她因此提出為有機茶開拓銷售網路，並且希望行動研究團隊提供協助。然而，2007 年茶業價格大幅下滑，有機茶的市場很難在短期內開拓，加上勐宋也在研究建立有機茶葉合作社，優內的想法因此未能即時落實。

CBIK 過去曾向優內、婦女小組和村民介紹有機種植，他們對有機耕種有一定的認識，故此當台灣「和平婦女」徐蘭香建議村民嘗試種植綠肥，改善稻田的肥力

從而增加水稻產量，他們也願意嘗試。雖然綠肥種植試驗只進行了一年便放棄了，但婦女小組和村民願意繼續探索有機耕種的技術，優內便在行動研究團隊的協助下，組織了一次有機堆肥培訓活動，並推動婦女展開有機堆肥的實驗。

除了探索有機耕種的技術外，優內在家裏設立了圖書室，希望加強婦女間的學習和交流。為了解決村民的生計，她又探索向顧客直接銷售有機蔬菜的可能。她們還組織了一次「社區漫步」，鼓勵村民關注村中的衛生和環境。

優內和婦女小組三年的行動計劃主要圍繞生計、生態和環境的議題，下面集中討論她們種植綠肥和進行有機堆肥的實驗，以及為光明村的有機茶葉開拓市場所面對的困難。

2.1.2 綠肥種植和有機堆肥實驗

2008年10月，台灣「和平婦女」徐蘭香到勐宋看望優內和婦女小組。蘭香有豐富的生態種植經驗，她發現勐宋的稻田很貧瘠，所以產量很低。她建議村民種植綠肥，增加土地肥力。優內徵求村民們的意見，有60多戶村民願意嘗試種植綠肥。行動研究團隊於是購買了200斤綠肥種子，發放給村民。他們將部份種子種到茶地裡，部份則種在菜田和稻田裡，前者未能成活，後者的長勢則很不錯。試驗結果顯示綠肥的確能改善土壤，然而村民沒有繼續種植綠肥，主要原因是綠肥長得高，在犁田的過程中不斷被絞進犁地的機器中。為了避免這個問題，就必須將長高的綠肥先割倒、再犁，但是這就增加了備耕的工序和勞力的投入。負責犁地的主要是男性，他們覺得種植綠肥改良土壤的方法太麻煩，不願意再嘗試，而婦女們覺得男性不同意就很難再做。結果第二年村民就沒有再種植綠肥了。

在村民放棄綠肥種植後，優內在行動研究團隊協助下，策劃了一次生態農業培訓。2009年夏天，大約30名婦女和村民參加了培訓活動。培訓員向婦女們介紹了健康土壤與環境、有機堆肥和培養微生物的方法，並和婦女小組們一起動手製作堆肥。培訓活動完結後，有18位村民報名參加堆肥實驗。她們希望將堆肥用於種植蔬菜、核桃，甚至作為茶葉的追肥。

婦女們掌握了基本的堆肥技術並願意嘗試，但堆肥實驗的具體開展日期一拖再拖，從2009年的冬天拖到次年春天，很快要到第二年備耕水稻的季節，但參加實驗的村民家開始做堆肥的很少。總結原因有兩方面。第一，這幾年因為茶葉價格大跌，村民生計不穩，婦女農閒時都外出或在附近打工賺錢，沒有時間做堆肥。第二，堆肥需要密集的勞動力，做堆肥用的大量草和青綠植物要用拖拉機運送。如果家裏沒有人幫忙，婦女要獨自完成，十分困難。

其實，在計劃推肥實驗時，已考慮到勞動力的問題，因此參與的婦女給分成小組，合作堆肥。有一些小組進行了堆肥，但由於各組使用的材料不同，做的時間和數量也不同，發酵的程度也不同。優內於是安排了交流會，讓婦女和村民交換經驗。

綠肥種植和堆肥的實驗，除了技術上的問題外，主要障礙其實是生計的問題，其次則是性別的因素。村民放棄種植綠肥，主要是因為必須增加勞力的投入，而勞力的投入不會即時帶來收入。同樣，堆肥也需要較密集的勞力，而參加的婦女，很多寧可在農閒時打工掙錢，堆肥的實驗便一再拖延。這些行動計劃展開時，正是茶葉經濟泡沫爆破後。作為村民主要經濟來源的茶葉價錢忽然大跌，令很多村民的生計出現困難，打工賺錢是解決生計問題最便捷的方法，生態種植便只能讓路了。

至於性別的因素，如前所述，不論是綠肥種植還是堆肥，都需要男性幫忙犁地或用拖拉車將收集所得的大量堆肥材料運回村裏。要是男性不同意或者不幫忙，婦女們就很難堅持下去。

2.1.3 有機茶葉銷售

光明村婦女小組組長優內一直渴望拓展有機茶葉的市場，無奈茶葉市場在 2007 年嚴重衰退。前面曾提到，在 CBIK 的幫助下，勳宋組織了有機茶葉生產合作社，勳宋古茶也通過了認證並註冊了商標。但是，由於合作社成立不久，為了保證銷售，只有少數人能夠入股成為社員，而且進入主流市場過程中，合作社面對重重困難，無法收購所有社員的有機古樹茶葉。

在主流市場中，有機茶葉每年都需要支付大筆認證所需的費用，只有大企業才能負擔，普通農民根本不可能取得認證。事實上，茶葉市場已經被大企業壟斷，而它們各自有自己的生產基地，很少向一般茶農收購茶葉。此外，在主流市場中，勳宋茶葉由於口味濃鬱苦澀，被茶商定位為配茶，用來與其他有名茶山的茶葉混合加工，提高茶葉甘苦的口味。這樣的定位令勳宋茶葉銷售價格很難提高。另外，茶葉市場混亂，造成茶質良莠不齊，人們對所謂的生態茶、有機茶半信半疑，也影響了有機茶葉的銷售。

行動研究團隊曾協助優內通過 NGO 的網路，瞭解是否可以以「公平貿易」、「社區支持農業」的形式來為光明村有機茶開拓另類市場，但一些從事「社區支持農業」的朋友回覆，按現有的茶葉品質、數量和預期價格，勳宋茶葉很難找到高價位。然而，光明村村民對開拓茶葉市場仍存有期望，因為茶葉始終是村民主要經濟來源。光明村大部分村民 2009 年的一年總收入在一萬元左右，其中茶葉帶來的收入佔近半。

2011年3月，優內跟行動研究團隊一起到了昆明，參觀了銷售生態農副產品的社會企業「綠耕昆明店」和「幫幫健康生活館」，又跟負責人談了銷售勐宋生態茶的可能。她又結識了四川成都「紫氣東來會所」的負責人傅雪梅，並向她詳細介紹了勐宋茶葉生產、加工、銷售的情況。傅雪梅隨即到勐宋考察，購買了45公斤勐宋生態茶。4月，綠耕負責人鄒胡東和黃亞軍也到了勐宋。之後他們購買了100公斤的生態茶，在「綠耕廣州店」銷售。5月，「幫幫健康生活館」也決定試售勐宋生態茶。相對於勐宋大量的茶葉產量來講，這樣的銷售量不算多，但對優內以及婦女小組無疑是一個鼓勵。

2.1.4 生態與發展的張力

勐宋愛侏人傳統的輪歇農業是靠土地的輪作和休耕來解決土地肥力的問題，火燒青綠植物是他們追肥的主要方法。70年代在政府的宣導下，愛侏人開始使用農藥化肥。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單一化的種植業也在迅速地消滅當地多樣化的農作物品種。過去在勐宋僅水稻和旱稻的品種就有30多種，而現在能夠保存下來的不到三種。原來廣泛種植的各種豆類、薯類、芋頭和各種蔬菜，現在也僅存少量的豆類。

單一化的種植業使得農民難以自給自足，生活和生產都日益依賴市場和現金收入。與此同時，愛侏人世代生存所依賴的鄉土知識，包括對自然資源的管理、利用，以及與刀耕火種農耕相關的系統知識漸漸地打碎，令他們越來越依靠外來資源和知識。

與此同時，從80年代起，「經濟發展」成為主流的社會發展模式。在東部與西部、壩區與山區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的張力下，生活在西部邊境山區的勐宋愛侏族處於邊緣位置。在這種張力的牽引下，「經濟發展」對當地政府和村民更感迫切，更無暇顧及當地生態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性。

在光明村，雖然村民知道化肥和農藥對健康和生態有不好的影響，但大部分村民仍繼續使用化肥和農藥，主要原因是生計的考慮。以除草劑為例，隨著茶葉種植面積成倍增長，茶葉地管理需要投入的勞動量急劇增加，使用除草劑給茶葉地除草是最省力的辦法。有機耕種同樣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投入，而且不能帶來即時的經濟收益，加上村民的生計正受到茶葉市場變化威脅，除了盼望茶葉市場復蘇，村民只能抓住眼前最快賺錢的方法——打工——來維持日常的生計，有機耕種的嘗試便只能擱下了。

「我們村裏每次都議論這個生態方面的，不管是做什麼產業，我們生產出來的產

品，都要做生態的，但是在價格上也不會提高。這樣的話，我們這邊做什麼好像沒有感興趣一樣。」優內這番說話，正好反映了光明村婦女和村民在生計壓力和「經濟發展」的主流意識型態下的感受。

2.2 (內蒙) 殷玉珍：種樹治沙與發展的張力

2.2.1 行動計劃背景

在早期的沙漠科學研究裏，作為「荒漠」的一種，沙漠是一個統稱，指的是「乾旱地區地表為大片沙丘覆蓋的沙質荒漠，也包含了沙漠化土地和半乾旱地區的沙地」，但後期的研究傾向把沙地從沙漠中區分開來，將之定義為「把分佈於草原和草原地帶以固定和半固定沙丘為主的沙丘地區稱為沙地」。⁴ 這區分清楚告訴我們，「和平婦女」殷玉珍的家——毛烏素沙地——原本不是沙漠而是草原。毛烏素是經過一個荒漠化的過程，才變成今天的沙地。

毛烏素位於內蒙鄂爾多斯高原東南部和陝北黃土高原以北的烏審窪地。鄂爾多斯高原是中華文明「河套人文化」的發源地，原本的生態和文化環境具豐富多元的特色。在植被地帶上，它處於典型草原向東南的森林帶和向西北的荒漠化草原帶的過渡；在人工生態方面，屬於農、牧、工礦的交錯區；社會文化系統方面，是一蒙漢為主的民族雜居區，歷史上就是游牧文化與農業文化的複合交錯區。然而，由於過渡放牧、樵采和開墾，植被不斷遭到破壞，特別是到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之後，該區政治經濟活動越來越頻繁，人口也急速增長，對土地造成更大的壓力。

解放後，政府基於生產的需要，多次大規模開墾內蒙古的草原，90 年代更引進外來資本，不僅大規模開發地面的草地，還大規模開發地下水資源和礦藏。自然資源產業的開發，使得蒙陝邊區的經濟迅速發展，但同時環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日益嚴重，相關的建設和城鎮化不斷吞噬耕地和草地，並破壞無定河流域的生態環境，使得原來脆弱的生態系統受到更嚴重的威脅。

從 70 年代起，中央政府開始關注沙漠化的問題，並且以種樹作為主要的治沙方法。殷玉珍是因為在治理沙漠方面作出驚人貢獻而贏得「全國勞模」、「十大女杰」、「三八紅旗手」、「防沙治沙標兵」、「雙學雙比標兵」等榮譽，同時給提名進入「全球千名婦女爭評 2005 年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地區的 108 人名單。然而，玉珍治沙，最初只是為了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

⁴ 盧琦主編，2000，《中國沙情》，開明出版社，第 4 頁。

1985年，19歲的玉珍在父親安排下，嫁給獨個兒在毛烏素沙地生活的白萬祥。初到毛烏素時，玉珍只見滾滾黃沙，一個腰高的小窩棚就是她和丈夫的家。玉珍哭了七日七夜，之後決意要活下去。憑著二人年青力壯，他們不但建了土坯房，還開始種糧食。爲了擋住風沙，他們在家的四周種樹，在十多年間種了數以十萬計的樹。1999年外界知道他們的事跡時，他們已爲毛烏素沙地造出了全綠化林地27300畝，林地面積2007年已達到5萬多畝。

樹木成林後，玉珍家四周的環境得到改善，風沙少了，降雨/雪量比30公里以外的鄉鎮高，植被得到某程度的恢復，耕作的產出也得以增加。成爲風障的林子也減低了風沙對樹苗的影響，存活率得到提高，樹成長後能提供枝葉餵養牲畜，不用倚賴放牧，牲畜的糞便又爲土地提供肥料。這樣，由種樹所引發的循環式自然農畜生活方式，以另一種方式發揮治沙的功效。

玉珍的努力，不但爲她帶來國內和國外的榮譽，還爲她帶來外部資源，包括來自政府的和私人企業的財政支持，而玉珍也想利用她的土地和知識，幹一番事業。「和平婦女」行動計劃開始時，當地政府已爲她建了兩層的水泥房子。一個私人團體捐錢爲她建了一個蒙古包，用來接待客人。2004年，私人企業給玉珍鋪設了一條正式的道路，路口豎了一個寫著「玉珍農林基地」的牌門。

2.2.2 建立生態教育基地

自從被確認為種樹勞模和環保先鋒，有機會參與不同地方的環保會議後，玉珍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不僅在中國，全世界亦然。在國內，以種樹作爲治沙的方法是主流，得到政府的支援，而玉珍也看到內蒙的綠化過程，認為有責任繼續種下去，並希望將自己20多年種樹治沙的經驗，傳授給別人。因此，她決意建立一個生態教育基地。

要建設一個生態教育基地，軟體和硬體要配合好。在軟體方面，除了需要尋找合適的團隊成員之外，一個教育基地還需要確定面向的是什麼人或團體，用什麼方式進行教育的工作等。玉珍跟環保團體和教育機構沒有很多聯繫，因此這方面完全沒有頭緒，唯一她可以使勁的地方是硬體的建設。在外部的支持下，這方面很快便準備就緒，只是具體的設計跟生態教育基地的想法可能有些衝突。

起初，鄂爾多斯市一家規劃設計公司給玉珍設計了一個生態園建設方案，但規劃的定位不是教育，而是將玉珍的農林基地發展爲一個旅游和接待的場地，宣傳鄂爾多斯的蒙元時期宮廷部落文化，涉及的投資高達800~900萬。玉珍對這個設計有些不滿，但玉珍心目中的生態教育基地的規模也不少，她認為起碼要能接待

120 人。

行動研究團隊一方面嘗試協助玉珍聯繫環保團體和教育機構，另一方面也就行動計劃提出了一些意見，其中包括教育基地的規模、對象、資金來源、基地對四周環境的影響和教育基地的可持續性等。就一個教育型的基地的可持續性來說，行動計劃團隊認為，如果這個基地主要提供體驗沙地、學習治沙、交流心得和反思固有生活習慣和價值的機會，而不是高度污染城市以外的又一個開會或度假的「世外桃源」，到來的人要做什麼，怎麼做，必須是由玉珍和她的理想團隊成員決定的，或者是跟他們商量的，而不是用主流消費者的心態來隨意做。因此，一個生態教育基地應該主要面向環保團體、大學生和熱愛自然的個人，而玉珍和她的團隊可以是主要的教育活動協作者，但這需要途徑和時間去聯繫和磨合。

行動研究團隊曾經跟北京的一些環保團體和大學聯繫，講述玉珍的情況與需要，但由於時間和人力都有限，當時未能為玉珍成功搭建需要的關係，讓她看到其他可能性。擁有類似工作模式和經驗的台灣「和平婦女」徐蘭香，2009 年探訪玉珍，與她交流發展生態教育基地的想法，雖然能引起玉珍的共鳴，但始終不是她要的方案。

2010 年玉珍出席行動計劃的「香港工作坊」時，生態園的建設計劃已獲鄂爾多斯市長批准。玉珍當時說，生態園將成為市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面向全國大學生。而據《中國日報》2012 年的報導，佔地 2000 畝的「玉珍沙漠生態示範園」已經建成。在政府的幫助下，生態示範園不但有專門的電力供應，還開墾了水澆地 500 多畝，建了八公里水泥路。生態示範園不但是治沙教育的一個基地，而且還提供休閒娛樂和運動健身的消費活動。而烏審旗市也會在生態園內建設面積達 5300 平米的「生態文明建設教育基地」。⁵

2.2.3 發展的張力

對鄂爾多斯市、內蒙古省到中央政府而言，無論是要推行治沙政策，還是開發大西北，玉珍的事迹正好為「大發展」提供感人的勵志故事，一方面展示治沙的效果，另一方面顯示主流規模化和快速發展的「優越性」。正因為如此，玉珍給發現後，政府和私人企業均積極介入，除了給玉珍各種榮譽外，也向她作出財政支持，讓生態園實行規模化的發展模式，並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作為生態園的規劃方向。換句話說，玉珍對生態教育基地的構思，由於受到政府和主流發展觀念的影響，不論是在規模還是功能上，都似乎跟她原來的想法背道而馳，而這反過來

⁵ 見「讓沙漠變綠洲——記錄感動中國人物」，原載《中國日報》，《競爭情報系統網》轉載，2012 年 8 月 10 日，見 <http://info.elion.com.cn/document.ejf?reference=e565ff65a5a384a04c9d9ffefd22b0b0>。

很可能會威脅生態園以至沙地的可持續性。

2010年玉珍和兒子國林出席行動研究計劃的「香港工作坊」時，國林表示生態園水位正在下降。地下水急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跟導致荒漠化的「五濫」（濫墾、濫牧、濫伐、濫采和濫用水資源）有關。研究沙漠化的一些專家認為，盲目開發生態環境脆弱的草原和沙地以及過度利用地下水資源，會造成地下水下降甚至乾枯。然而，在「有利於」沙區經濟發展和群眾收入的前提下，即使國家的治沙專家，也建議「適度發展沙產業」，例如旅游資源、風能資源、礦產資源等。隨著這些資源的「開發」而來的，不僅是土地的開墾，還有工業和商業的建設，以及人口增加和城市化帶來的對水資源的壓力，可以說與治沙目標相矛盾。

在荒漠化嚴重的西北地方，水資源「濫用」無可置疑跟「開發大西北」等主流發展有關。玉珍家附近就不斷有開礦的鑽探工程在進行，而整個地區都在大量開採天然氣和其他礦產，玉珍的林子為那裡帶來的額外雨量，遠遠追不上「發展」所耗用的地下水。

自從種樹治沙在政府政策推動下成為「熱潮」，玉珍一家也獲得另外的收入來源。除了來自政府的種樹補貼外，玉珍還開發了培育樟子松樹苗的基地，自己不用買樹苗之餘，還可以將樹苗賣給別人。另外，由於來買楊樹的木材的人多了，他們也開始賣木材。可以看到，種樹在玉珍他們後來的生活中，已經不僅提供生活需要的原材料，而且還為她一家賺取現金收入。除了賣樹苗和木材外，玉珍還種植和銷售「綠色產品」，如西瓜、土豆、小米、黃米、綠豆等，另外還養牛羊。總之，不論是生產活動還是接待數以百計來參觀吃飯的人，都要用上大量的水，而且用量必定不斷增加，對當地的水資源自然也構成壓力。

雖然如此，玉珍的「沙產業」，相比龐大的國家或大資本的發展項目，一家人、一個規模不算很大的農耕基地和一個大部分成材的林子，就算影響地下水，都是有限的，速度也不會很快。但是，由於政府和私人企業的介入，她後來建成的生態園不但建設規模大，運作模式也受著主流的發展模式影響，地下水以至其他自然資源必然受到更大的壓力。問題是，玉珍是否意識到，經濟優先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及大自然應該為人類「所用」的功能性思維，正是現時中國土地荒漠化形勢呈現出「治理與破壞」相持，甚至「治理趕不上退化」情況的根本原因。

3. 和平方動的性別主體

3.1 (山西) 王樹霞和段鎖蘭：女性作為生態耕作轉型的知識主體

3.1.1 行動計劃背景

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 2011 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大陸每年施用的農藥超過 130 萬噸，化肥則超過 4000 萬噸，以播種面積計，分別是全球平均水準的兩倍多和三倍。由於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中國大陸受污染的土地超過 2187 萬公頃，佔耕地面積 16%。

在中國大陸，上世紀 50 至 70 年代，農藥化肥隨著農業現代化進入農村，由集體供銷社供應，各村並設有技術員，指導農民定時施肥噴藥。但是國產化肥農藥產量不多，不是每個生產隊或每個村都獲得分配。但是，從 80 年代初開始，農民已經可以輕易在市場上買到化肥農藥。

位於山西省汾陽市附近的栗家莊村全村有 580 戶村民，大都以務農為生。1995 年前，栗家莊村以種植大麥、高粱、黃豆、玉米等糧食為主，但由於水資源日益短缺，加上果樹經濟效益較高，村民逐漸改種梨、蘋果、桃、核桃和棗等果樹。隨著果樹面積不斷擴大，栗家莊變成了一個規模化的水果種植區。栗家莊上到村委，下到村民，都將「工業富村、林果興村」奉為圭臬，但以追求高產為目標的規模化種植，產量主要依賴大量使用農藥化肥。

被評選入中國「和平婦女」108 人名單中的王樹霞，一直在栗家莊村帶頭搞文化和生產建設，包括組織栗家莊婦女協會和養豬合作社。另一位女農段鎖蘭是王樹霞的工作夥伴，並與王樹霞一起在村裡推動「和平婦女」的行動計畫。

2008 年 8 月，鎖蘭出席了行動研究計畫的「銀川工作坊」，有機會反思自己家鄉的農業和農民面對的問題。鎖蘭的丈夫在村裏為其他村民打農藥，由於常常接觸農藥，健康轉差。想到丈夫和全村人的健康，鎖蘭決心行動起來。她制定的行動計畫，目標是全村停止打農藥，行動方案首先是通過宣傳，讓村民認識農藥對健康的危害，然後找尋農藥的替代物，推動全村向生態種植轉型。

鎖蘭對行動計畫充滿信心，因為栗家莊擁有能替代農藥的現成資源——沼液。沼液由人畜糞便和植物等有機物經厭氣發酵形成，含有的激素和抗生素等能幫助作物抵抗蟲害。栗家莊第一個沼池是樹霞 2004 年建的。她當年參加了鄉建學院的培訓後，想在全村推廣沼池。2006 年，省政府、村委和村民共同出資，在村裏建了 103 個沼池。

3.1.2 生態種植與健康生活培訓工作坊

要讓村民放棄使用化肥農藥，必須先讓村民認識到化肥農藥的害處，樹霞和鎖蘭為此在 2008 年冬季舉辦了一個「生態種植與健康生活培訓工作坊」。

爲了開好這次培訓會，從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培訓回來的我們，更是信心十足，姐妹們都積極地參與了進來。侯玉香、李俊梅每天組織婦女們跳舞排練，更加認真；陳麗清幫我們找場地、找投影器；我和鎖蘭、寶麟更是上網查找有關生態環保的知識，進城列印宣傳畫報；村委朱繼堯支書也大力支持我們，給我們提供了中心廣場的厚玻璃宣傳欄，列印了會標等。大家又分頭到戶宣傳、確定能堅持聽三天課的人員。

——王樹霞，2009，《我們不能少看自己》，王樹霞的博客，10月2日

樹霞和鎖蘭邀請行動研究團隊協作這次培訓，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三名成員則提供技術支援，台灣的「和平婦女」徐蘭香也特地來到栗家莊，跟村民分享她的生態種植經驗。培訓工作坊上，大家首先討論的是使用化肥農藥後農地的變化，如土壤板結和地下水受污染，以及村民的健康如何受到影響等。之後大家談到生態農業的概念、以沼液代替農藥的方法和養草的好處等。工作坊又示範如何製造果樹營養液。三天的工作坊，每天都有 50 多位村民出席。

樹霞和鎖蘭事後走訪參加者，他們大都認同必須停用農藥，但同時擔心不用農藥，一旦發生蟲害，收入會受到影響。

3.1.3 以沼液代替化肥農藥的實驗

儘管村民對以沼液替代農藥信心不足，但有十戶村民同意參加 2009 年的生態耕種轉型試驗。爲了減輕村民的憂慮，鎖蘭她們決定先進行小範圍試驗，參加的農戶只拿出一部分果樹做試驗，並且只在不那麼關鍵的時間噴沼液。她們還給每戶做了「有機果樹示範戶」的牌子，讓其他村民看見試驗的進行。

與此同時，鎖蘭在徐蘭香的「養草護土」理念啓發下，率先在自家果園養草。過去，村民認為草會跟果樹爭肥，影響果樹產量，所以總是把草鋤得乾乾淨淨。徐蘭香探訪栗家莊時，注意到這情況，指出養草有助保護水土。鎖蘭於是在草結籽前將草割下來鋪在地上，發現鋪有草的地濕濕的，有助保水。另外，草經過一段時間堆漚，變成了肥又回到了地裏。

一年後，鎖蘭總結試驗，認為使用沼液和養草果樹長得較健康，所以建議增加沼液的使用量和噴灑次數，並進行養草。她又走訪了十多戶沒有參與試驗的村民，

鼓勵他們加入試驗，試驗戶因而增加到 20 戶。大家贊成鎖蘭的建議，鎖蘭自己家更撥出三畝的果園中做全面使用沼液的試驗，並系統地記錄了果園出現的變化

但是第二年的實驗計劃遇到一些困難，包括沼液供應不足和有些試驗戶的果園出現較為嚴重的蟲害，因此沼液的使用量和噴灑次數沒有增加，有些反而減少了。鎖蘭家的試驗果園也遭遇了蟲害，但她和丈夫堅持不用農藥，結果減產約六成。不過，鎖蘭她們沒有氣餒，因為早有心理準備要為試驗付出一些代價，而且她家有其他收成，足以維持生計。

養草的試驗成績較為理想。農戶認為養草的確可以保水，而且草的品種變多，果樹變壯，益蟲多了，害蟲少了。總的來說，兩年行動的初步結果，是村民改變了對草的看法，確認草不僅沒有影響果樹結果，還對果園整體產生良好作用。至於以沼液和其他營養液完全替代農藥，因為生計的考慮，村民仍有保留。

3.1.4 水果品嘗和果園觀摩交流活動

兩年的試驗後，樹霞與鎖蘭認為應讓參加試驗的農戶跟其他村民直接交流，一起到地裡比較果樹和土壤的變化。2010 年 10 月 8 日，村裏舉行了一個水果品嘗和果園觀摩交流活動，有 30 幾位村民出席，另外還有陝西果農代表和汾陽市的幾位消費者。試驗戶拿出自家的梨和蘋果來給大家吃，讓大家比較水果的品質。這是栗家莊開始種水果以來，農戶第一次互相品嘗種出來的水果。參觀結束後，大夥兒回到樹霞的院子，一起討論生態耕種的「代價」、政府的角色和消費者教育等問題。

2011 年初春，鎖蘭開始在果園裡試驗新的生態種植技術——性誘劑，用物理的方法來防治蟲害。她還在果樹下移栽除蟲菊、大蒜、綠肥等植物，增加果園的生物多樣性。

3.1.5 女性作為知識主體

王樹霞和段鎖蘭都是《農家女》雜誌社的通訊員，一向在村裏積極向婦女推廣健康及法律知識。2008 年，她們爭取到《農家女》雜誌社支持，在樹霞家裏的院子建立了農家女書社，推動婦女一起學習。由此可見，樹霞和鎖蘭二人不但自身愛學習，而且樂於向村民（尤其是女性）推廣新知識。因此，當她們瞭解到化肥農藥的危害時，自然也竭盡所能地推動村民向生態耕種轉型。

栗家莊村的果樹技術員任永忠（男性）開始時對生態種植並不看好。由於栗家莊村村民的果園規模不大而且很分散，他認為要組織村民做試驗並達至生態轉型很

困難。他的看法並未打擊樹霞和鎖蘭二人的決心。參考了任永忠的意見，鎖蘭她們選了果園相對靠近、家裏已經有沼池或參加了合作社的農戶，游說他們參加實驗。鎖蘭自己也參加了實驗，既是為了示範，也是為了掌握第一手經驗，結果原來以為是天方夜譚的集體行動得到實現，並且改變了技術員的看法。後來，任永忠不僅參與果子品嚐會，還跟鎖蘭她們合作辦培訓，把養草、防蟲、處理爛果、增加土壤的肥力等他懂得的生態農耕技術，傳授給村民。

第一年試驗後，鎖蘭對推廣生態種植信心十足。她本想在擴大實驗前再做一次培訓，讓更多村民加入。然而，她在走訪中發現村民很想瞭解她的試驗結果。這讓她意識到「鑽到地裏去做」、用「行動」來說服別人比搞培訓請專家更有效，於是放棄了辦第二次培訓的想法。

在第二年的實驗中，除了邀請更多村民參加實驗外，鎖蘭更做先鋒性的嘗試，在試驗的三畝果園裏全部和全時間用沼液，不用農藥。雖然堅持繼續用沼液導致了經濟損失，但鎖蘭沒有失去信心，相反她認為從中獲得的經驗，可以成為未來實踐的基礎。

除了通過實踐掌握知識外，樹霞和鎖蘭也很重視村民之間的交流和共同學習。她們每年把參與試驗的村民約到家裏，分享收成的情況和對試驗的發現，又交換解決難題的意見。鎖蘭說，試驗開始後，每逢下雨天，不少試驗戶都到她家裏坐坐聊聊，在電腦上查查資料。她自己一有空，就串門，在閒聊中傳遞自己的經驗和見聞。女性通過觀察和交流掌握知識，就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發生。

行動研究結束後，鎖蘭和樹霞繼續社區的宣傳工作。無論是閒聊時還是籌備文化演出，生態試驗和健康生活都是主題之一。鎖蘭還向村民講述其他「和平婦女」如何推動生態農耕，讓大家知道不光栗家莊在試驗生態耕種。她又結合近兩年栗家莊氣候異常的情況，給村裏婦女講解全球環境惡化的嚴重性以及環保事業的重要。鎖蘭就像信使，把宏觀的和微觀的環境問題都分析給婦女聽。樹霞也把試驗和參與行動研究的外訪經驗編成小品，在春節聯歡會和三八節演出，擴大宣傳農藥化肥的危害以及栗家莊的生態試驗。

鎖蘭和樹霞推動生態農耕試驗的重要效果之一，便是與當地村民一起，在再生產這些知識的過程中，重拾農民和女性的主體意識和位置。研究開始時，她們十分重視外部「專家」和男性的知識，但她們相信，農民擁有基本的生產和生活知識，是農業的實踐者，可以通過觀察、記錄、討論、反思與總結等方法去解決問題。兩年的行動計劃令她們對男性和專家的態度，由仰視變為平視，也令她們更重視通過自身的實踐累積知識。

3.2 (江西) 王華蓮與婦女鼓隊：社區音樂的行動主體

3.2.1 行動計劃背景

中國從 1978 年起啓動的市場經濟改革和高速城市化發展，給「和平婦女」王華連遍遠的家鄉——江西萬載縣白水鄉——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像大部分中國農村一樣，這個資源豐富、環境優美的客家山村，漸漸只剩下婦女、老人和小孩，農田丟荒，自然環境資源遭破壞，農耕鄉村生活文化消失。

香港的「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The China Social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簡稱 CSD) 於 1994 年到白水開展婦女項目。CSD 希望通過婦女集體合作，回應全球化和現代化對農村資源和生態的榨取。他們協助當地婦女組成互助儲金會（以下簡稱「儲金會」），主要活動是種植和銷售有機百合粉。

儲金會由白水永新村路下和灣里兩個村民小組的婦女組成。當年，每人只要交一塊錢就可以加入成爲會員，參與勞動和其他會務，也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從儲金會成立到 2008 年間，華連跟主席許國蘭兩人，一直出任委員和主席的職位。除了生產有機百合粉外，儲金會還組織婦女健康檢查和教育活動，利用滾動基金建會所，開辦學前班和婦女文化掃盲班，推行改善兒童健康的早餐資助計畫，承包山坡種植經濟果林，購置碾米機、粉碎機和打漿機等。

「和平婦女」行動研究團隊成員趙群 2008 年 6 月到白水探訪儲金會，觀察到儲金會內部「有一定的危機」。同年 8 月，華連在行動研究計劃的「銀川工作坊」報告儲金會的工作時，表現出很大的無力感。據研究團隊瞭解，在銷售百合粉的利潤該如何分配以及分工的問題上，儲金會成員有不同意見，而且失去了互信。

自 1994 年被選為儲金會委員後，華連一直沒有離開過儲金會，也沒有像其他年輕婦女般，跑到外省打工。她形容參加儲金會是她人生的轉捩點。儲金會不單成爲一個婦女合作的集體平台，也讓華連跑出路下灣里，接觸到「公平貿易」、「生態農耕」以及城鄉關係等議題。2005 年華連被提名爲千名「和平婦女」之一，並應邀參加兩年的行動研究計劃。但是，在華連的行動計劃中，沒有再提儲金會的有機百合。她提出的行動計劃是發展村裏的水資源和建立婦女腰鼓隊。

3.2.2 建立婦女鼓隊

為甚麼會有建立腰鼓隊這個想法呢？華連說看到別的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活

動，覺得對社區的氣氛很好，而儲金會什麼文化形式都沒有，就想有一種文化活動。另一位婦女晃南說，幾個年輕人去縣城看到軍鼓隊表演，感到表演得又好，還可以賺錢。如果儲金會的婦女也有一個軍鼓隊，可以增加活動項目，可以鍛煉身體，還可以賺點錢。無論腰鼓隊這想法是怎樣出來的，反正儲金會的婦女，尤其是年輕的一群，都想試試。辦腰鼓隊免不了要用錢，儲金會雖然有基金，但主席許國蘭反對動用基金。根據華連的理解，主席覺得這是年輕人的玩意，老人不會跳，所以反對。

儲金會的基金不能動，外來支援也不足以支付所需開支，但華連沒有氣餒，她讓儲金會成員開會討論如何自願湊錢買鼓。華連說：「當時來開會的也就十幾個人，大家討論出委員和小組長每人出 300 元，其他成員每人出 200 元。這樣臨時湊了 3000 多元。」去買鼓時，賣鼓的人說腰鼓不流行了，勸她們改買軍鼓。考慮到軍鼓隊可以有較多人參與，也不想搞已被淘汰的鼓樂，她們就決定買軍鼓。

2009 年初，婦女們開始在儲金會的房子學打鼓。她們白天做農活，晚上就到儲金會練習打鼓，雖然很累，却充滿快樂的笑聲。她們將鼓隊名為「永新和平鼓樂隊」，並選出王華連為隊長，除了學打鼓，還學跳舞。婦女們沒有請老師，自學光碟和自己就是老師，華連很多時起著帶頭作用。她說：「每次都要我先學，要我先看。我每天一個人認真的看，學會了再教她們。」

在學打鼓的過程中，鼓隊成員間也經過一些磨合。剛開始，有些人不能接受別人說她不會打鼓，隊員之間有些小矛盾。但是在華連的勸導下，大家為了整個集體的榮譽，小矛盾也沒有了。練習累了，她們就休息一會兒，圍在一起聊天，把白天的勞累拋到九霄雲外。婦女們的學習能力很强，進步很快，從學譜、練習打法、配合腳步，到隊形排列，在組成鼓隊三個月後，她們已經在萬載縣第二屆百合花節上作第一次公開演出。

3.2.3 社區音樂工作坊

2010 年初，行動研究團隊邀請了香港「噪音合作社」的 Billy、北京「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李昕等，組成「江西社區音樂工作團隊」，到白水跟婦女鼓隊作音樂上的交流，並舉行了兩次社區音樂工作坊。社區音樂團隊的出現，讓婦女們的想像再次起飛，不但學跳舞，還學創作，並且重新探索當地的音樂傳統。在唱彈跳（創）作的同時，團隊嘗試在內容上導引工作坊的方向，改寫改編傳統山歌，為傳統節拍配上對大地和環境的關懷：

*大地是我的母親
躺她懷中得溫飽*

垃圾農藥傷害她
大家來想該咋辦唉~~~

社區音樂團隊又把《江西是個好地方》這地方民歌配上新詞，改名為《灣里路下是個好地方》。這首舊曲新詞一唱，馬上有人提議來一支隊歌。順著婦女的訴求，婦女們練習敲擊節奏、為山歌填上新詞、跳舞、聲音訓練並共同創作了《大地之歌》：

大地長出綠油油的莊稼，
母親哺育了我們成長。
請原諒我對你無心的傷害，
謝謝你給了我們幸福的生活。

婦女喜歡邊跳邊唱的感覺，喜歡自己編寫歌詞，希望能夠自我伴奏，還有演出小品。有人說：「像山上砍這麼多樹，會影響我們喝的水。如果編成小品表演就好了，我們就怕自己搞出來不好看。還有垃圾到處是，河裏面紅的、綠的、黑的、什麼都有。」

3.2.4 社區音樂會

李昕和 Billy 根據他們過去在深圳和北京搞工人文藝的經驗，建議搞一個音樂會，讓社區裏不同的人互相看見，感受音樂中的感情和資訊。第二次社區音樂工作坊結束時，社區音樂團隊提出，趁當地每年舉行的百合節搞一場音樂會，由婦女鼓隊負責聯絡和組織。除婦女外，也邀請老人協會、小學生和傳統音樂人參與。

2010年5月22日，《白水百合情》文藝演出在白水中學舉行，婦女們除了軍鼓、舞蹈、歌唱以外，還自編了小品《村裏有了垃圾池》。老人協會則不單組成腰鼓隊，還舊曲新編歌詞：《贊百合之鄉》和《送春調》。小學同學們一直排練自己填詞的《我的家鄉》，以豎笛伴奏。

2009年5月婦女鼓隊剛成立不久，經打鼓老師引介，鼓隊在白水的百合節作了第一次演出，獲得非常好的評價。對鼓隊來說，演出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光是2009年下半年，鼓隊就有不下十次紅白二事或是慶祝新樓落成等演出。但是，這次音樂會令鼓隊婦女們的情緒更高漲。婦女們不但因為自己的演出而感到快樂，合作籌辦音樂會的過程也讓她們之間變得更有默契。而且，村子裏久違的集體生活，因為舞台而再次出現，不同的群體也因為這次演出而互相欣賞。

音樂會後，社區音樂團隊跟鼓隊婦女回顧一起走來的經驗，實際的困難和盼望。之後，婦女們做了個一年工作計劃，包括繼續學跳舞、軍鼓、樂器、樂譜、唱歌、寫小品，還要繼續演出，要寫小品，等等。

3.2.5 面對水污染問題

2009年婦女鼓隊成立後，行動研究團隊曾跟婦女們談到鼓隊的將來，婦女們提出年輕人外出打工、水資源污染和垃圾處理等問題，其中討論最熱烈的是水污染。華連說，村裏一直是喝老儲水井中那些山水。2007年冬天「新農村建設項目」為村裏修建新井，之後飲用水就變得混濁。婦女們建議覆蓋輸水管道，行動研究團隊則提出保護水源森林和試驗生態農耕（包括使用家肥土農藥、稻田養魚等）和垃圾分類，但婦女們的反應不大，華連則認為這些想法「不大可行」。

常規農業對環境的影響，華連很瞭解，她自己的菜園固然沒有用農藥化肥，家裏的稻田即便已經讓給別人耕作，也反對他們使用農藥，就連她本來在街上經營的飼料店，也因為她不想賣化肥農藥早已結束了。但是，村裏的稻田和百合田，大部份仍然使用農藥化肥。村民擔心，一旦不用農藥化肥，產量會受影響。而且當地的田多在上山，挑農家肥需要很多勞動力，用化肥就輕鬆多了。也有人認為，如果只有幾戶人實行生態耕種，事情很難成功，因為蟲都會跑到沒有用農藥的田裏去。雖然如此，鼓隊還是將化肥農藥對生態和健康的危害，編進小品裏去，讓村民認識這問題。

然而，本來一直說很困難，似乎無望的事情，有人願意嘗試了。2010年音樂會後，陸陸續續有七位鼓隊成員開始不再在稻田中放化肥農藥。村民又邀請了江西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的老師去給他們講解生態種植的基本知識。在沒有什麼外來資源的投入下，村民種了一茬有機水稻。

2011年5月，五位村民到貴州學習生態農耕，回家時背包塞滿貴州百宜瓦窑村的老品種紅米、糯米、玉米、豆子，還有可防蟲害的烏頭苦參。回到白水，他們在村裏搞了一個放映和學習交流會，還煮了一大鍋紅米飯。村民在品嚐貴州老品種紅米飯之餘，爭著檢視米呀豆呀苦參呀，還爭著發問和表達意見。之後，一些婦女開始應用學習到的田邊堆肥和用當地的植物做土農藥，發掘出白水被淡忘了的土方法。其中一名婦女觀華說：「我不管人家怎樣說，反正我自己先做試驗。做得好了，他們自然就知道了。」

鼓隊方面，雖然沒有再辦音樂會，但她們創作了一個關於化肥農藥的新小品。鼓隊成員計劃先自己做生態農業試驗，然後用小品宣傳。鼓隊還應邀參加了一個文藝活動，演出了關於農藥化肥的改編山歌，華連說觀眾反應不錯呢。

3.2.6 婦女作為行動主體

嚴格來說，行動研究應是婦女和研究團隊結成合作夥伴後，一起行動和思考經驗，在過程中凝聚知識和智慧，並最終帶來價值觀和行為的改變，解決婦女們或者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困難。但是，這只是理論，現實往往超出研究人員的想像或計劃。華連與婦女鼓隊的行動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這個例子也為行動研究應有的開放精神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在行動研究的「銀川工作坊」上，華連提出建立婦女腰鼓隊，原因是婦女們希望有多些運動和多些文化活動。華連的行動計劃跟研究團隊的想像有很大的距離。基於儲金會的歷史，研究團隊一直著眼於生態耕種和互助合作如何回應幾十年來的常規化學農業，（新）自由市場經濟以及各種政府政策對農村生態、生計以及文化傳統的破壞。因此，當華連和婦女們提出水污染的問題時，研究團隊提出以保護水源森林和試驗生態農耕為主要策略。有關文化，研究團隊心目中的是傳統的客家音樂和山歌，而且暗暗期望白水跟台灣美濃一樣，傳統文化的承傳跟生態和生計議題得到連結。

但是，儲金會的婦女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一方面出現內部的信任危機，另一方面對村裏日益惡化的生活環境，大都感到無能為力。相反，她們對建立鼓隊的事充滿熱情。鼓隊建立後，她們也不畏辛勞，每天在忙完家務和農事後，堅持一起學習和排練。即使存在資金和老師的難題，她們也沒有放棄。究其原因，可能是鼓樂相對那些層層相扣牽涉存活的現實，是一種力所能及的夢想。但是，從鼓隊的成立和後來的發展，我們可以見到，婦女強大的主觀意願，可以給一個她們看來很簡單的行為注入無限動力，並且帶來難以想像的可能性，遠遠超越行為本身。再者，在這些行動裏，人以及各種關係，特別是個中的感情部分，是一般「發展」工作沒有也不能計算或量度的產出和邏輯。

結果，一個簡單的願望加上婦女的決心和行動，不但讓她們增加了自信，同時也為社區創造了改變的條件。對婦女們來說，鼓樂給她們打開了一道門，既是向外的也是向內的。向內的，就是那種實在的不騙人的身體和精神感覺：快樂、自信、樂觀。向外的，就是為社區帶來動力，刺激思考，並讓婦女自己和其他社群都勇於撇開種種現實的考慮，嘗試踏出原來認為不可能的一步。在這過程裏，作為行動的主體，她們的身體感受跟理性認知通過文化表達得到結合，原來看似跟白水社區生活沒有甚麼關係的鼓樂，成為社區尋覓出路的一支號角。

4. 另類生活的可能性

4.1 (香港) 王愛華、楊寶熙、陸少瓊：從食物展開的城市生活思考

4.1.1 行動計劃背景

食物本來是生物最原始最本性最親密最自然最不可或缺的生活夥伴。人類跟食物的關係糾纏，在提供基本的養分維持生物性的運作中，還細細編織了一整套共生的存活文化，因時因地因社群而千變萬化豐富多姿，讓我們快快樂樂享受與天地相處的日日夜夜。先輩用生命與自然共生的努力，編寫了幾千年被稱為文明的概念，裏面包括食物的生死觀：從生產、製作、食/使用，到回歸自然的一整套技術、環境、人文和社會文化生態關係和價值觀，是如此緊密地環環相扣，難以割切。現代生活把食物約化為貼上價錢的消費品，食只是讓身體有飽的感覺和概念；食物像人一樣，在講求效率和利潤的社會發展意識形態中，只能有一個單一和破碎的存活，本來整全的生命是抓不住的泡沫。

一代代在香港這高速膨脹的城市長大的，只知道蘋果橘子西瓜是超市架上來的，分不清五穀雜糧四時蔬果，難辨鷄鴨豬牛羊的雌雄鹹淡水產的腥鮮……味覺被各種各樣防腐劑調味精馴化了，不再能嘗出陽光雨露土壤的味道、四時的轉化、山水的姿彩……吃的習慣和文化也被城市生活規範化了。香港農漁業，也因為政府長期忽視，我們有田不（讓）耕，有魚不（讓）捕，以為只要有錢，食物便可以從世界各地取得無限量供應，而沒有思考已經迫在眉睫的全球糧食危機問題對 700 萬人口的影響。例如蔬菜的自給率由 70 年代的 70% 跌至 80 年代的 30%，90 年代更急速下滑，2011 年跌至 2.3%。除了量之外，較為有質素保證和擁有很低「食物里數」的本地生產，更是難尋。

正是由於政府對食物、農漁業和環境危機的長期無視，以及近十幾年以大型基建之名更密集地徵收農地和清拆農村，加上地產商收購和囤積新界土地伺機發展，引發了不少香港民間團體和個人自發行動起來，對抗主流發展的洪流和保護鄉郊和生態環境：有些在新界租用荒棄農地魚塘種植有機蔬菜（甚至嘗試恢復已消失的稻米）；有些組織城市的消費者，通過共同購買支持本土農業和守護新界土地；有些以食物加工支持本土生產；有些搞有機農墟讓生產者與消費者互相看見和交流；有些主辦生態和農耕的教育活動，促進城鄉互動；有些回收城市二手物/廢棄食物循環再用；有些在政策層面推動土地正義和向政府施加壓力；等等，其中婦女的角色非常突出，包括搭建消費者和生產者橋樑的共同購買團體「自在生活」（現已結業）的楊寶熙和婦女環保團體「綠色女流/綠慧公社」的陸少瓊和王愛華。

4.1.2 「快樂廚房@社區」行動計劃的展開

由三位香港「和平婦女」與研究團隊的香港成員陳惠芳、陳順馨和劉麗凝共同推行的「快樂廚房@社區」（簡稱社區廚房）行動計劃，正是希望用公開飯聚的形式，帶出食物本身的豐富內涵，以至讓更多人反思上述城市人與食物的切割關係，進而改變食的習慣，重新認識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食物社區和土地，從而整體上支持農漁業的本土生產。這種被稱為「有名有姓」的飯聚，每個環節都受到重視：餐單的設計，食材的來源，食物烹調的過程，生產者與勞動者的出場，食飯的氛圍，飯後的清潔和廚餘處理，食飯故事或感受分享等，顯示社區廚房要帶出的「社區人地情，人間風和味」元素。

2010年間，團隊總共舉辦了兩次社區廚房飯聚，第一次在屯門的自然學校，第二次在因興建高鐵而被迫快將清拆的元朗八鄉菜園村。兩次彰顯的社區元素各有不同。第一次跟屯門這個地域性社區的關係不大，更能帶出的是食物背後的社區網路：廚藝和心思都非常了得的愛華是素食餐單的設計者；蔬菜主要來自粉嶺一位本地有機農友琴姐；其他一些食材來自廣西的小農（通過「自在生活」購買），幫忙準備和烹調食物的婦女來自不同地區，但都是愛華的朋友；參加者來自不同的年齡層；以「一人一劇場」形式表演食物故事的朋友是本土的年輕藝術工作者；清潔劑來自生產環保肥皂的「綠慧公社」等等。第二次菜園村本身便提供了重要的社區元素：作為一條一直維持農業生產的村落，村民種植的通菜、香茅、木瓜、沙葛、鳳眼果、淮山等，為社區廚房提供了最本地和時令的食材；進行烹調的廚房正是一位村民送娣家裏的廚房，而她也參與了食物的製作；參加者通過村民導賞活動親身體會鄉郊社區生活，是理解為何需要支援村民反對清拆的最佳途徑。

4.1.3 社區有廚房，廚房有社區

「快樂廚房@社區」行動所帶出的社區概念，其實是有兩方面的：一是指具有空間或社群意義的社區，即在生態、生產、人文等方面各具特點的活動地方或群體，以及烹調的食物和快樂地進食跟這個地方或群體的關係；另一是指從種子到餐桌的食物過程涉及的網路與各種關係，即在隱藏在送進嘴巴的每一口食物背後的沒有邊界或者是跨越界綫的流動社區。前者是摸得到、看到見的，無論是屯門自然學校或菜園村，通過一個參與式的快樂廚房活動，參加者會對那個地方或群體增加認識和歸屬感，彼此也增進了感情，或產生互相支援和傳遞資訊的社會效果，這些都是增進該小社區以至整體香港的大社區的凝聚力的重要元素。後者則是較難感知到的，特別在香港這樣高度城市化和依賴進口食物的地方。由種子到餐桌，食物之所以能成為我們身體這個小宇宙的養分，其實涉及每一樣原材料的生產、處理/加工、運送、市場（銷售與購買）、廚房烹調、進食這些環節。

出外吃飯，一般我們只看到食物端在餐桌和進食這個最後的環節，在家裏吃飯的，也大多只經歷到市場或超市購買食材和在廚房烹調的後期加工環節（有些甚

至不會參與這方面的勞動)，很少看到或想到食物源頭、初期加工和運送這些更為影響我們或跟我們的身體（小宇宙）和生態環境（大宇宙）的環節。姑且先放下食物安全的問題不談，如果我們意識哪怕只是一口的飯菜，其實是跟一個緊密相連、層層相扣的社區網路發生關係的時候，我們會更珍惜這口飯菜，對養活我們的、由大自然和很多人共同組成的食物社區和要用心才能保持平衡的社區關係表示感激和尊敬，並意識到身為這個社區的一員的責任和義務。

既然跟世界或大宇宙發生關係，上述食物的每個環節，如果處理不好或受到操控，不僅影響身體健康和生活安全，還為生態環境、小生產者的生計和文化帶來重大的破壞和傷害，而這些破壞和傷害正在香港以至全球蔓延。可以說，愛華、寶熙和少瓊在“快樂廚房@社區”活動中堅持支持本地小生產者和小銷售者、儘量利用本地生產或較近距離獲得的有機食材、不時不食、安排食物生產者和製作者出場、促進傳統食物加工手藝的傳承（特別是年青人）、帶出食物與人地情的親密關係、尊重付出勞動的人、按需要進食、不浪費食物、廚餘回田、呈現食物的記憶和故事、拉進人與人的距離、等等，都是對應這些圍繞食物而產生的隱性暴力的和平行動，讓參加者思考，我們願意吃進肚子裏的，是一個由有機的微生物、太陽、雨水、空氣、順應自然、尊重勞動、平等、互相依存、促進本地經濟、安全、清潔、滿足需要組成的「世界」，還是由化學品、違反自然規律、人工改造、急功近利、剝削性、操控性、污染性、浪費、滿足欲望組成的「世界」？

4.2（台灣）徐蘭香：從護士到養生到集村的嘗試

4.2.1 行動計劃的背景

徐蘭香在「銀川工作坊」所訂下的行動計劃，是建設「養生護士俱樂部」。在主流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俱樂部」是給有閒階級的人玩樂的地方，但在蘭香的心中，「樂」却是一種真正與自然和諧相處而獲得的身心健康的快樂，而這個「俱樂部」不是安置在高級的空調房子中，而是安住在大地；可以一起彙聚其中的條件，不是靠能付得起昂貴的入會費，而是願意共同行動，保護大地。蘭香說，要實現這個構想，需要經歷幾個過程：「人的共識、地的尋找、集村制度、養生技術連接、強大的護士反擊」。

現在在台灣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從事生態農業和釀造的徐蘭香，90年代初反對政府為修建高速公路截斷她當時居住的新竹關西長壽村的飲用水源，開始行動起來，後來成為台灣環保運動的一名硬將，曾經參加的抗爭包括反對污染性很高的農藥廠、反對資本家以威迫利誘的手法大量收購農民的土地來興建高爾夫球場等等。她看到台灣急速的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和城市化）與資本化發展，已經大大

破壞她童年記憶中的美好生態環境和鄉土生活，例如自 50 年代始，水稻一直是整個台灣最主要的農作物，佔總耕地面積超過六成。但到了 70 年代中，儘管開發山坡地讓總耕地面積上升，水田的面積却在下降，比例跌至 56%，原因是很多水田變為非農業用地。與此同時，台灣的化學工業和核電等高污染的生產也在全面發展，排出來的廢水嚴重污染農業資源和生活環境（土地、河川等）。這些環境問題促使台灣環保運動的出現與成熟，過程中，蘭香參與的針對化工廠的抗爭起了先鋒或奠基的作用。根據台灣學者蕭新煌就 1980~1996 期間發生的環保抗爭事件所作的研究⁶，蘭香參與抗爭的 90 年代初也是環保抗爭的高峰，就 1991 年就發生 258 宗。農業生產方面，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也同期出現，除了有化工廠生產的供應外，早期因為政府要增加產量而帶動的化學農業已形成農民的「慣行農法」，大部分台灣農民不僅認為不用化肥農藥無法保持高產量，還錯誤地相信化學農業是現代和進步的象徵。

4.2.2 「養生護土俱樂部」背後的理念

養生必須先護土，是蘭香的核心理念，而護土的第一步就是不要使用農藥化肥。她以「放毒給大地母親」來象徵農民下農藥化肥，現在「母親」已在哀嚎，種出來的都是有問題的食物，人類長期吃就生病，接著被送進一般是西醫主導的大型醫院，繼續吃有毒的化學藥品（西藥）。她有一句名言：「多一個有機農村，少一間大型醫院」，很能代表她的想法。此外，她認為養土一定要先養草，因為恢復生物鏈要從根本著手，而草可以保持土地的水分，並製造一個益蟲和害蟲可以互相制衡的生態環境，消除對農藥的倚賴，恢復土地與人的健康。另外，懂得健康的是偉大的農民老祖先，因為身體健康是靠健康的食物而來的，而不是靠吃藥的，所以她無論到哪里，都呼籲村民把老人請出來，向老人學習他們的健康生活之道，還有他們觀察土地和傳統農耕的方法。除了重整知識系統外，對結構性問題的認識也很重要，即不要玩資本主義的遊戲，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的各個環節（政府官員、商家，知識分子等），都高度警惕，並提出批判。對於「發展」這個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把戲，蘭香曾經很形象地指出它是一種「一人笑萬人哭的東西」，即一種少數人獲益、多數人受害的行為。

蘭香的「養生」概念，來自她對三個「生」的認識：生命、生活和生計，而這些都跟生態密切相關，甚至是前提。

跟一般或主流的「養生」概念很不同，蘭香認為土地養育的生命，不僅是人類，還包括野生動物、植物、昆蟲、微生物等所有眾生；人類的生命也不僅是身體的，還有心理的和靈魂的。可以看到，蘭香沒有把人抽離整個生態系統，而是視之為其中一個環節。人類健康和安全的生命來自平衡的生態，而這是建基在物種的互

⁶ 蕭新煌，1999，《台灣的地方環保抗爭運動 1980 至 1996》，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相依存關係上的，所以人類不要用自己的觀念去決定其他物種的命運，只有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它們，人類才能挽救自己。除了肉體生命需要好的環境來維持外，蘭香認為，人類心靈的障礙，如痛苦、憎恨、貪欲、緊張等，也會在一個平衡的生態環境中得到釋放，從而獲得平靜、安詳、自在和快樂。今天生活在高度物質化和崇尚金錢和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特別需要這樣能放鬆和具有生命力的環境，所以在她想像的「養生護士俱樂部」中，會包含心靈療養的部分，讓來的人敢哭敢笑敢怒敢言敢戰勝自己，從而得到心身的平衡與恢復。

生活又有別於經濟面向較為突出的生計，涉及不同的文化內涵，如人際關係、社區建設、傳統文化的傳承等。蘭香以「多一個有機農村」來展現健康生活的圖景，是因為非常重視生態農耕的集體性，而事實上，以生態循環為基礎的傳統農耕，是需要集體共同勞動，才能夠出現的。生活習慣和態度的改變也是針對生活而進行「養生」的重要面向。為什麼現代人願意花錢去看病住院，而不願意花錢在吃得健康上？這是蘭香經常問的問題。她提出的一個重要口號——「把土地吃乾淨」，是鼓勵消費者通過消費有機或天然農產品或農業加工品，除了達到養土的環保作用外，更能支持堅持用有機農耕來養土的農民的生計，達到社會的整體健康，減低醫療等方面的社會開支。蘭香認為這些都需要消費者從自然中學習，順應自然規律（例如吃當地當季的食物），有意識改變生活的習性和態度，揭穿資本主義「價廉物美」的消費謊言，才能真正做到養生。

作為一個有生態和生活關懷的生產者，蘭香對於如何維持生計，那就是她從事的工作的經濟面向，自有其獨特的看法。在她心目中，真正的經濟不是錢，而是「經世濟民」，而要經營的那個「世」，是包含野生動植物的安全的，而要「濟」的那些「民」，是包括子孫後代的安全的。換句話說，生計不是個人溫飽或財富積累的問題，而是包含生態關懷，和人類可持續生活的內涵的。因此，蘭香認為，無論做什麼工作都要算經濟，而「算」的含義是將「人情、公義、慈悲、善良、不說謊、人倫」這些錢買不到的元素放進去，共同建構一個對野生動植物和子孫後代公平的社會。蘭香這些提法或理念是針對主流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總的來說，蘭香認為只要做好生態工作，錢就會跟著來，我們不用花精神和時間在追錢的問題上。有了經濟的基礎，除了能滿足家庭生活上的需要，還可以「有槍有子彈」，跟資本主義和不良的政治「宣戰」，保護生態和小生產者的生計，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4.2.3 「養生護士俱樂部」行動過程：從外出探訪到「集村」的嘗試

要在那裏建立「養生護士俱樂部」或者是如何建立，蘭香作了多方面的探索與準備。第一個階段的行動是從訪問其他和平婦女和跟她們的交流中獲得啓發與尋找可能性，包括到優內的家鄉雲南西雙版納勐宋和王華連的家鄉江西萬載縣灣里路

下村，重拾對環境還沒有如台灣那樣被發展破壞的地方的美好感覺、濃濃的人情味以及逐漸失落的傳統智慧；到段鎖蘭和王樹霞的家鄉山西汾陽栗家莊村，體會集體行動的可能行；到香港探訪楊寶熙時，看到極端消費主義社會的問題，從而強化她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護士養生的信念；到殷玉珍的家鄉內蒙古毛烏素沙漠構想一個設在生態沙漠農莊的「養生護士俱樂部」的可能性。

經過第一個階段的探訪，蘭香總結到還是應該在熟悉的環境實踐自己的理想，因此展開第二個階段的行動：嘗試集合一批又共同理念的人，長期集體務農和生生活，以類似小型村落的形態，實踐養生護士的理念。這便是她的行動計劃中的「集村」構想。蘭香對集體性的追求，主要是對抗資本主義生活形態的個人化和零散化問題的。今天的台灣，以傳統小農的耕種方式合作生產的農村已經很少，不僅像蘭香老家那樣的村落和生活方式不見了，如蘭香那樣被零散化的農戶，雖然能通過商品市場購買或租用土地進行個別的生產，但原有的農村生產關係已經被切割了，田間大多像蘭香觀察那樣，沒有了農民集體勞動的笑聲，只有機器聲或孤獨的農人或農工。因此，蘭香認為，對抗資本主義的最好方法，是反零散化或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恢復在土地上集體勞動和生活應有的功能與樂趣，因為農耕始終不是一個人的事，以農為本的生活本身就是分享性的。這樣，當蘭香身邊出現志同道合的人時，便開始集村行動。

首先被蘭香的理想吸引的是三位年輕人，她們達成的共識是共同擁有生產資源、分工合作、公平分配、儉樸生活、同吃同住、自給自足、土地正義、分享快樂，可以說具有很濃的共產主義理想。首先她們在蘭香原有的農地上開始集體耕作，並創意地用二手的物料製作小型手動農具，勞動之後是生活上的分享：共同做飯，吃飯，玩耍等。與此同時，她們構想將來集村的藍圖。硬件方面，村子面積大約 20 公頃，裡面有澆灌池、生態池和雨水收集池，建居住的房子三間（每家一間）和供接待運動團體的房子三間，材料用稻杆和泥，自己動手做，並種上一些植物防治土的流失和種香蕉樹做圍欄。生產方面，主要是農耕和食物加工，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儘量不用大型機器而用人，還可以用香蕉纖維生產布（從紡到織到做衣服）。生活方面，則儘量集體化，以節省能源；要丟掉一些城市生活的東西，以簡樸為原則；吃自己種的東西，穿自己做的衣服，也給來的人吃和穿；一起做一起玩，寓工作於娛樂；儘量不跟政府和市場打交道，實踐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但跟環保團體打交道，因為是環保運動的一種實踐方式，也應為運動做出一個示範。

可以看到，這種近乎烏托邦的集村想像，聽起來會讓人對其部分構想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存在一定懷疑，而事實上這些年輕成員後來也因不同的原因，未能堅持下來，集村在 2011 年這個行動研究項目結束時還沒有出現，但它是對應著蘭香對資本主義和台灣社會的批評和不妥協，並展示了她對實踐自己的理念所作的努

力。當然，這樣理想化的集村計劃，對成員的要求是很高的，容易出現曲高和寡的情況。成員之間的信任和感情基礎必須很穩固，才能順利展開和持續下去。蘭香經過多年抗爭和實戰經驗而形成的強硬形象和不妥協的態度，或許未能吸引很多人加入，但這也符合蘭香一直的理念——從小做起，甚至變小（相對資本主義的要變大），才能啟動和持續下去。一個最後扎根於台東的「養生護士俱樂部」是否會出現，或最終以什麼形式出現，我們拭目以待，但到目前為止，蘭香的努力和走過的路，是有其參照價值的。

4.2.4 結語：一位地球守護者與母親的和平願景

蘭香在實踐「養生護士俱樂部」理想所作的努力，凸現了她一直沒有改變的生態關懷和大愛精神，讓我們看見一位地球守護者的身影：

最大的和平就是讓野生動物有棲息之地，不是針對人而言，是萬物共存。這個地球是萬物共存的，不是人獨大的。如果這個世界都是人，那是一個魔鬼的世界。⁷

在 2010 年 12 月的香港工作坊中，蘭香給自己未來的祝願，則顯示作為母親的她，如何如同守護地球那樣守護著自己的孩子，守護著自己的信念：

愛女兒像自己的生命一樣，女兒會像你一樣會面對環境，面對人生，面對壓力，正面迎接，你的女兒也要享受自己努力得來的結果。你已經給了很大的財富給她們，那個財富不是錢，是愛，是公義，以及敢於做自己，至少。你的人生方向已漸確定，不再惶恐。⁸

母親孕育孩子的心情和過程，應該是所有都應參加蘭香的「養生護士俱樂部」的我們，對於大地應有的心情和過程，這樣，結合生態、生計和文化的和平工作就能持續下去。

4.3（四川）高芙蓉：以建立城鄉共同體保護地球

4.3.1 行動計劃背景

高芙蓉（蓉蓉）的家鄉是四川省郫縣安德鎮的安龍村。像大多數農村青年一樣，

⁷ 徐蘭香與殷玉珍交流紀錄，毛烏素，2009 年 6 月 26 日。

⁸ 在香港工作坊的總結環節中，我們邀請每位和平婦女寫一封信給自己，作為對自己的和平願景，所以信中的「你」就是蘭香自己。

1992 年高中快要畢業時，她便離家進城打工。她的哥哥和弟妹也都離開了家鄉，只留下父母在農村。2007 年春節蓉蓉放假回家，看見向有機耕種轉型的父母種地很辛苦，決定留下來支援父母，之後更動員了哥哥一程回來。蓉蓉和一程從城市向農村回流並投身農業，在社會主流的生活模式中，可以說是逆流而上的另類選擇。

在「和平婦女」行動研究計劃的「銀川工作坊」上，蓉蓉表示希望建立一個沒有城鄉差距，以共同保護地球為目標的「城鄉共同體」。具體來說，她希望自己實踐有機農業之餘，帶動更多農民加入有機耕種的事業。

中國大陸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始於上世紀 50 年代，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制度、糧油供應以至戶口制度等，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徹底分割。1985 年，「人民公社」解體和家庭承包制出現後，政府提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但只是「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務工經商」。可是，隨著外來資本流入和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對廉價勞動力的龐大需求吸引大批農民進入城市打工。

9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進一步向國際資本開放，加上消費市場的形成，除了進工廠外，農民工也大量投入服務和建造業。對各地政府而言，鼓勵農民出外打工是不需要什麼投入的脫貧工程，因此 90 年代出現如「一人打工，全家脫貧」、「勞動力出去，財富進來」等口號。當在城市打工的農民開始過剩，部分人希望返鄉時，政府則鼓勵他們在鄉鎮投資，轉到工商和服務行業中去，用另外一種形式讓「財富進來」。

由於青壯年大量流入城市，農村勞動人口大幅減少，農業生產比過去更依賴化肥農藥，加上主流發展方向和政策對農村不利，農民生計不穩，出去了年青人大部份都不願意回鄉務農，留在城市却往往備受歧視和剝削。蓉蓉的家鄉四川省是農民出外打工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2012 年農民工人數達 2414.6 萬人。

蓉蓉的父母向有機耕種轉型，源於成都河流研究會（河研會）改善河流污染問題的計劃。2005 年河研會協助安龍村 11 戶農民打沼氣池、建生態廁所和學習生態農業的方法。他們又組織交流活動，讓成都有心的消費者跟這 11 戶農民接觸，並安排消費者向他們訂購有機蔬菜。可是，蓉蓉決定留下來的 2007 年，已有六戶農民放棄，只剩下五戶，包括蓉蓉信佛吃素的父母。

蓉蓉決定留在家鄉務農後，即學會駕車並貸款買了一部舊麵包車，為包括高家的五戶農民給消費者配送蔬菜。一年後，訂購安龍村有機菜的城市家庭已經有差不多 100 個。蓉蓉還說服了父母把家裡的四畝地全部用作有機種植，除了蔬菜外，

還種稻米、小麥等糧食。

2007年成都的消費者開辦了有機產品的小市場，安龍村農民可以在小市場銷售他們的產品。訂購有機菜的消費者又到安龍村探訪農戶，並參與農務。安龍村農戶和消費者間的互動，成為「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一個重要示範。最早支援在中國大陸推展CSA的「社區夥伴」這樣介紹CSA：

從字義上看，CSA指社區的每個人對農場運作做出承諾，讓農場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為該社區的農場，讓農民與消費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擔糧食生產的風險和分享利益。這是一種城鄉社區互相支持，發展本地生產、本地消費的社區經濟合作方式。在這種合作的基礎上，CSA一方面看重在保育生態和資源下共同承擔、互相分享的社區關係，看重社區中情感及文化的傳遞；另一方面則往往會推行健康農作法、永續生活及包括身、心、靈在內的整合的健康觀念。

4.3.2 配送蔬菜和消費者教育

2008年當哥哥一程還沒有回來時，蓉蓉主力組織連高家在內的五戶生態農民向成都消費者供應蔬菜。這個過程非常不簡單，從送菜前一天各家總動員收菜、清洗、分配、裝袋到蓉蓉收集其他四戶的菜袋，開車往成都，然後在不同地區挨戶發送菜袋等，整個過程需要大量勞動力、精神和時間。除了每個家庭內部需要分工合作，五個家庭之間也需要互相配合。後來一程代替蓉蓉負責這個工作，也開始聯絡新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生產逐漸穩定，配菜的份數後來也慢慢增加。

聯繫消費者方面，也是由高家負責。蓉蓉很重視跟消費者的互動，這不僅為了建立健康的交易關係，還因為她有建設城鄉共同體的理念。從蓉蓉講述她一周的工作/生活情況，可以看到一個要兼顧生產、配送、消費者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家庭的忙亂和辛勞：

我在家怎麼過，從禮拜一開始，禮拜一上午就到地裏幹活，下午就要配菜，禮拜二要送菜，禮拜天比較空一點，整天都在地裏，有很多活，覺得忙也忙不過來，禮拜四又成這樣了，上午種地，下午配菜，禮拜二我哥去送菜了，我就可以安排地裏的活，有時候我哥不在家，外面有什麼事，哪裏有什麼活動就要讓我去參加，星期五又幹活，星期六和星期天就下不了地了，就要幫我媽燒飯了，要跟那些人講解了，每天就這樣過的，非常忙碌，中途會有人來訪，要接待一些人，我跟我媽說以後有人來我不接待了，你們接待，可是有時候媽忙不過來也要去。

4.3.3 生產者的聯系和教育

蓉蓉曾說，生產者的聯系和教育工作比消費者的難，但擴大和穩固生產隊伍是不能不作的。銀川工作坊後，蓉蓉想再跟河研會合作搞系統的農戶培訓，加強交流和討論，但後來農戶間出現了矛盾，她失去了信心，最終沒有搞起來。不過，蓉蓉知道，在這幾戶農民中，她一直是帶動者，所以她決定自己先搞好技術，然後才組織大家一起交流學習。

2009年，三戶農民自願參與進來，並由一程帶動做。由此可見，高家和其他幾戶農民的實踐和建設，無論從理念（保護生態、吃的健康、良心種植、對消費者負責等）到實際運作（種植方式、運輸、消費者網路、透明度、宣傳等），的確起了示範作用，為進一步的發展打下基礎。

4.3.4 掌握生態種植技術

蓉蓉在「銀川工作坊」提出她的行動方案時，強調要從土地做起，而她最想改善的是土地的養份。她從書本中學到自己做土著微生物來殺菌、促進堆肥的發酵和釋放土壤的肥分。另外，她瞭解到植物輪作可以減少蟲害和避免土壤養分失去平衡，以及按照屬性配搭種植蔬菜的種類等。

蓉蓉認為，有些從書本學來的技術，部分的確可以更新一些老方法，例如以前做堆肥不會加微生物，現在用了確實能加快發酵；書本也能更系統地收集和整理一些從經驗總結出來的知識，如驅蟲植物的種植和配搭等。但是，她認為不少技術和經驗，還得向上一輩農民請教和靠自己摸索。一方面，不少農耕經驗豐富的老人，雖然非常懂得做，但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為語言並非他們最習慣使用的表達工具；另一方面，農耕本身就是要靠對變化中的環境和氣候做出觀察和判斷，靈活處理，不能死板地按照一套講法去做。向老農學習，就是要學習這種懂得觀察、摸索和判斷的知識和智慧。

4.3.5 建立生態農耕示範園

除了著力吸收生態農耕的知識和技術外，蓉蓉的行動計劃還包括擴大耕種面積，建立一個生態農耕示範園。蓉蓉希望可以藉此吸引村裡其他農民轉型。她認為，大多數農民對環境和健康問題認識不足，對市場或消費者也缺乏信心。她希望通過一個生態農耕示範園，「總結經驗，讓新加入進來的人，不要走太多的彎路。」

2008年蓉蓉家總共有五畝多的地，種植蔬菜為主，其中租來的九分地用來種小

麥和稻米，主要作為家庭的口糧，剩餘少量的供應給消費者。她希望第二年將耕種面積增加至 15 畝，這樣比較容易在種植上作規劃。除了蔬菜外，她希望能夠多種糧食、草藥、香草、水果。她認為多樣化的農場可以形成一個循環，把生物鏈恢復起來。2009 年，她租下了家附近的七畝地，但卻面對很多困難，包括跟家人有不同意見和資源上的限制等。

2010 年 12 月在「香港工作坊」上，蓉蓉說她不再堅持用一個生態農耕示範園的形式來實踐自己的理念，而是外向地組織更多農戶一起做。她打算將部分土地分租給城市消費者，作為生態教育的一種方式，部分土地她用來嘗試不同的種植。但是，2012 年蓉蓉在徐堰河邊租了地，建立了她自己的農場，叫「百草園」。她為十多個城市家庭供應蔬菜和糧食外，還帶 CSA 實習生和組織農村體驗的親子活動。另外，她又種了各種香草，自製了香精提取蒸發器。

4.3.6 總結：逆流而上的選擇

雖然經歷種種障礙和困難，蓉蓉終於建立了一個生態農耕示範園，在相關理念、認識、知識和技術方面，也取得很大進展，特別明顯的是她通過自己摸索而獲得的生態農耕知識和技術。她掌握這些知識和技術，不僅是為改善生產的品質，還在於通過分享、討論和互動等知識傳播的方式，帶動更多農村的生產者和城市的消費者加入保護生態環境的行列。至於一程，則仍然跟父母和其他幾戶農民一起向消費者配送他們種植的有機蔬菜。

蓉蓉與一程這樣的打工青年回鄉實踐生態農耕，不僅能維持生計，更能對生活有新的思考，對生命有新的追求。雖然像他們一樣的年青農民現在只屬少數，但他們的實踐毫無疑問為農村青年立下了另類榜樣，而 CSA 的概念與實踐則為他們的另類選擇，提供了理論上以至實踐上的支援。反過來，由於高家和安龍村生態農民的堅持，CSA 成為當地的一種社區經濟模式，而城市消費也認識到他們的健康和存活問題跟「三農」問題息息相關。同時，安龍村生態農民的實踐，展現了農民的主體性、創意、智慧和主動性，改變了主流社會對農民和農村代表「保守」、「落後」的刻板印象，讓更多人看到農村厚實、活潑和多元化的生活和文化；相比之下，城市的生活可能更單一、枯燥和不可持續。

5. 總結：可持續平和的條件和願景

基於「和平婦女」的經驗和這項行動研究的啟發，我們總結可持續平和的條件和願景四點如下：

5.1 從日常生活做起

戰爭（包括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和內戰）與日常生活暴力的性質是相同的，源頭也是相通的，那就是日益短缺的地球能源和土地資源的爭奪、霸權主義的格局與意識形態（包括國際與國內政治、跨國資本與全球化經濟、男權等）、競賽或競爭（包括軍事、科技、經濟等方面）的心理、文化偏見與衝突（包括種族、宗教、階級、性/別、地域等）。戰爭其實是日常生活常態和秩序的搗亂和破壞，讓人民的生活空間變成戰場，生命進入危難的狀態，同樣，非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的危機，其實已是戰爭的前奏。因此，和平行動遠遠超乎停止戰爭引發的直接暴力的和解努力或戰後的補救舉動，而是從日常生活入手，防止制度和文化等間接暴力的出現。和平研究學者約翰·加爾通將前者稱為「被動的和平」(negative peace)，後者稱為「主動的和平」(positive peace)。⁹ 主動和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危機，如保護生態環境、珍惜與共享資源、促進民主與平等、實踐互助合作精神、搭建關係、放下偏見與執著、促進瞭解等，會間接減低戰爭爆發的機會。

5.2 重視婦女的智慧與行動力量

生態女性主義曾經指出，人類對地球的壓榨，跟男性對女性的壓制是出於同樣的霸權邏輯¹⁰，因此，瞭解在主流性別秩序中處於劣勢的婦女的處境，重視其生活與行動的智慧和價值，不僅可以促進性別平等，還能恢復生態平衡。從參與這次行動研究的每一位「和平婦女」身上，我們都能看到婦女擁有的生活智慧與行動力量：玉珍在惡劣環境中展示的强大生命力；海瀾種植葡萄治沙的勇氣；蓉蓉回歸家人和土地後拼發出來的毅力與創造精神；鎖蘭與樹霞的思考、嘗試、社區動員與組織能力；華連的利他精神與婦女鼓隊的創造力；優內與法內突破文化與地域上的障礙，為村民尋找可持續生計的努力；愛華通過食物向身邊的人傳遞鄉土風味和傳統智慧；少瓊超越家庭角色的限制，建立合作的關係和熱心參與社區事務；寶熙搭建生產者與消費者網絡、促進城鄉互動的努力；蘭香强大的實踐與思考能力以及捍衛地球的決心與勇氣；靜慧回鄉與維護生態環境、農村社區與客家傳統的智慧；來紅、秀枝與「主婦聯盟」成員凸現的主婦力量與環境友好生活的動力；等等。她們的智慧與行動力量除了有性格的因素外，主要是來自對生活的觀察與投入，還有由多樣情感所激發的能量，包括對家人的愛、對土地的聯繫、對自身處境的感知、婦女之間的認同感與姐妹情誼、對下一代的關注、對平等、正義的嚮往、對理想的執著、對自我實現的渴望等。這些在強調客觀理性的男權社會中一般被忽略或壓抑的婦女智慧與力量，是維持和平行動的不可或缺的條

⁹ Galtung, Johan. 2005.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In *Peace Studies: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ed. Matthew Evangelista. London: Routledge, pp. 21-52.

¹⁰ 參看 Warren, Karen J. ed. 1994. *Ecological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Warren, Karen J. and Duane, Cady eds. 1996. *Bringing Peace Home, Feminism, Violence, and N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等生態女性主義文獻。

件。

5.3 打破身份、地域界限

暴力很多時是由人為的隔閡造成的，例如身份、地域界綫等。

5.3.1 研究者與行動者的界限

在這次行動研究中，我們試圖打破的第一重界限主要是圍繞研究者與行動者的身份的，即視研究團隊的工作為和平行動的組成部分，而行動中的「和平婦女」也是研究者。換句話說，研究與行動不應分開，因此需要打破被主流學術固定的研究者與行動者身份想像，即研究者應該是專業的、抽離的，行動者則是非專業的、投入的，後者是前者的研究對象。研究團隊成員對於自己是在執行和平行動有一定的認知，例如意識到與「和平婦女」之間需要建立「去權力」化的關係等，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否能做到與「和平婦女」共同推動行動計劃，並協助她們共同記錄、討論和反思（即研究）自己的計劃，成員中間存在一些困惑或疑惑。無論如何，雖然實踐上存在某種局限性，打破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身份界綫，仍然是我們的和平願景之一。

5.3.2 地域上的界綫

第二重我們希望打破的是兩岸三地「和平婦女」在地域上的界綫，以及包含在內的城鄉界綫。雖然這些界綫的形成，存在我們無法逾越的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但我們看到，在整個行動研究的過程，「和平婦女」之間不僅沒有出現矛盾，還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與合作關係。在交流的過程中，大家不是沒有意見上的分歧，但只限於工作方法，相反，對於一些地域差異造成的溝通障礙，大家還能做到互相包容。在「和平婦女」互訪交流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一些不自覺的不對等關係的出現，源頭也是上述的城鄉、地域分隔問題。我們最初構想分別在大陸、台灣和香港舉行三個工作坊，正是希望提供機會讓兩岸三地的婦女在各自的生活情景中互相看見，藉此消解大家對對方錯誤的想像，增進真實的認識。雖然在台灣開工作坊沒法實現，鎖蘭與樹霞在看到香港資本主義的剝削性後，能打破原來對香港繁華都會比中國農村優越的印象，已很好的說明了打破地域隔閡的重要性。當然，根深柢固的地域界綫仍然影響著我們的認知，但這次「和平婦女」的行動過程告訴我們，性別間的認同、情感的建立以及對生態、生計和社區文化的共同關懷，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界綫造成的障礙，而存在於兩岸三地的差異性，更帶來不同的知識碰撞機會。

5.4 和平的邏輯及價值的傳播

「和平婦女」在行動中體現的另類邏輯與價值重建，如果能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並且成爲人類的普遍價值，便能爲可持續和平提供關鍵的文化資源。以下這些我們在「香港工作坊」總結出來的和平邏輯與價值，希望能爲抗衡戰爭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發展主義等主流價值，提供參照：

- 對生命/傳統/不同文化的尊重；
- 對土地的情感；
- 對身邊的人寬容、接納、真誠、互助、開放、付出；
- 對自身信念的堅持；對個人能力抱有自信和獲得發揮的機會；
- 快樂生活是自給自足，互相依存、分工合作、動手創造、心身合一、文化多元；
- 社區精神來自本土、參與、民主、共融、文化傳承、各種關係的搭建；
- 集體價值與集體生活再被確認；
- 農的價值與作爲生活方式再被確認；
- 小型社區經濟代替大型擴張性全球經濟；
- 從小事做起，回應大環境；
- 每個人都是知識的主體。

研究團隊製作《婦女、和平與可持續生活》紀錄片系列，以及出版《扎根於生態、生計、文化的“和平婦女”行動研究》一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和這個研究報告的網上版，是衆多傳播這些價值的途徑之一，我們希望中國「和平婦女」扎根於生態、生計與文化的和平行動，能爲人類面對的各種危機，帶來行動的動力、啓發與希望。

行動，就是和平的開始，也是和平得以持續的基石。

完